

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征婚启事

1923年,55岁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贴出了一则征婚启事,要求对方的条件:一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;二、年龄略大;三、熟谙英文,能成为研究助手。其实,这已是蔡元培第二次贴出征婚启事了。

第一次征婚,强调男女平等

蔡元培第一次的征婚启事是在结发妻子去世之后。他的结发妻子名字叫王昭,1889年与蔡元培结婚。这一年,蔡元培22岁,考中举人后迎娶了第一位夫人王昭。二人相敬如宾,王昭有时称丈夫为“老爷”,蔡元培不以为然。可是就在这一年,年仅35岁的王昭因病医治无效,撒手人寰。蔡元培悲恸地说:“自由主义君始与闻,而未能免俗,天足将完,鬼车渐破,俄焉属纆,不堪遗恨竟终身。”王昭去世后,前来提亲说媒的人络绎不绝,踏破了门槛。一些好友打探蔡元培有什么要求。蔡元培干脆贴出了一则征婚启事:“一、天足者;二、识字者;三、男子不得娶妾;四、夫妻意见不合时,可以解约;五、夫死后,妻可以再嫁。”一个偶然的机

会,他结识了才女黄世振(又名仲玉)。

1901年,蔡元培在朋友家做客,看到了一幅工笔画,线条娟秀、栩栩如生,落款题字也颇见功力。蔡元培被这幅画吸引住了,不禁连连赞叹。朋友见他喜欢这幅画,就介绍说,此画出自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世振之手,黄世振是当地有名的才女,而且是个新式女子,没有缠足,有文化,精通书画,端庄贤淑,孝敬父母。听完介绍后,蔡元培怦然心动,主动托人提亲。1902年元旦,蔡元培举行了一生中的第二次婚礼。在结婚典礼上,他别出心裁,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闹洞房。结婚后,蔡元培自觉践行男女平等,主动帮助妻子承担一些家务。

第二次征婚,要求文化素质

1920年底,北京大学派蔡元培去欧洲考察。而就在此时,爱妻黄仲玉不幸病逝。蔡元培闻听噩耗后,悲痛异常,泪如泉涌,含泪写下了著名的《祭亡妻黄仲玉》。黄仲玉去世两年后,工作繁忙,家庭负担,使蔡元培觉得需要有一人帮他分担。于是他决定续娶,并提出了三个条件。此时,一位名叫周峻的女子走进了他的视线。周峻是蔡元培的学生,她一直敬佩和热爱老师,33岁还没有结婚。1923年7月10日,蔡元培西装革履,周峻身披白色婚纱,举行了结婚典礼。蔡元培还为这次婚姻赋诗一首:

“忘年新结闰中契,劝学将为海外游。蝶泳鹤飞常互且,相期各自有千秋。”周峻陪伴蔡元培走完了一生。蔡元培病逝后,周峻含辛茹苦,抚养孩子长大成人。孩子们都能遵循父母的教诲,刻苦努力,在学问造诣上都有所建树。次子蔡柏龄与法、美两国科学家合作发现反磁铁矿现象,荣获法国科学院银质奖;三子蔡怀新为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,著作很多;幼子蔡英多是沈阳黎明机械厂高级工程师,卓有建树;次女蔡辟盎为中科院上海分院研究员、全国政协委员。

(摘自北京日报)

中国古人喜欢郊游 先秦的“风情游”

先秦的“风情游”

先秦是个热衷于郊游的时代,无论贵族还是平民,似乎都对郊游情有独钟。孔子的弟子曾点就特崇尚“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的郊游生活。对此,孔子只说了四个字:“吾与点也!”赞成曾点的想法,可见孔子也是个郊游迷。先秦古人的郊游浪漫而“风情”。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总集《诗经》里,有许多爱情诗篇,都是时人郊游的记录。《出其东门》诗起首便是“出其东门,有女如云”,出了城唐代称郊游为“踏履”。魏晋时期的“郊游热”出现在达官贵族之中,到了唐代,才成了群众的喜好,尤以京城长安为最。长安东南郊区曲江风景区,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。曲江是个人工湖泊,开凿于隋初,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观。虽属皇家花园,但对市民开放。每到中和节和上巳节,曲江两岸游人如织,以致长安几成一座空城。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也在上巳节前,会聚京城的学子,更会利用这个机会到曲江尽情游玩,愉悦心情。而且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,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。唐人热衷于郊游,除了与国力强盛、社会稳定有关外,与假期多和上层的大力提倡也有直接关系。《唐诗纪事》记载,唐代从皇帝到臣僚都喜欢郊

游,并因此形成了制度。每年春天,皇帝都会带着后妃、朝臣游梨园,到渭水边游览祭祀;夏天游葡萄园,秋天则登大雁塔。唐人称春季郊游为“踏履”,宋代人多称“踏青”,并设有“踏青节”。在宋代,郊游也出现过小高潮,但人们更喜欢选择清明节外出,而非上巳节。张择端的传世名画《清明上河图》,所描绘的主要内容之一,便是北宋都城汴京人,在清明节这一天郊游踏青的情景。南宋时,清明节踏青已成为时人风俗,周密《武林旧事》中即称,南宋人“寒食祭先扫松,清明踏青郊行”。(摘自北京晚报)

· 荐书

《探路之役：1978-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》作者：萧冬连 版本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令世界瞩目,不过“中国奇迹”并不完全等同于“中国模式”。前者只在事实层面进行阐释。经济增长之所以是奇迹,原因之一是在20世纪后期大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浪潮下,放眼望去,只有中国最成功。秩序相对稳定,并在此条件之下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经济制度的过渡,这曾一度令世界学术界陷入解释困境。而在国内,长期以来参与解释的主要是经济学家。其一,中国奇迹表现在经济增长,经济学有解释优势。其二,经济学家是经历和介入实际经济改革的群体,或是政策的参与者,或是在公共领域建言者。只是,立场不同、研究范式不同,他们给出的解释也不同。萧冬连作为一个历史学者,从史料中回顾1978-1992年的经济改革,以一种全景式的方式试图呈现前因后果。他虽不像经济学家那样关注何种经济制度更能带来经济增长,但也给出了一个关键判断,即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绝不是一个意外的结果,也不是提前设计的结果。他认为奇迹离不开当年“随机行走”和有限理性兼备的开放探索方案。

乾隆皇帝如何以植树比喻做官?

清朝定都北京后,朝廷很重视植树,护河堤,防风沙。乾隆皇帝更是身体力行,倡导植树造林。他曾多次巡查京城的树木种植情况,并根据北京地区的气候和土质特点,提倡多植柳树和槐树,出台了种植树奖惩措施,还写下了一些有关植树的诗。

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,有乾隆植树碑一通,正面刻有乾隆御笔题写的《种松诗》一首:“清明时节宜种树,拱把稚松培植看。欲速成非关插柳(柳最易活,折枝插地即成,根亦易长,种树十年计盖谓此。若松柏二三十年尚不入观也),把清芬亦异滋兰。育材自合求真干,絮矩因之思任官。待百十年远,童童应备后人观。”落款为:“种松戏题,丁未仲春中浣御笔。”据说此碑原为圆明园遗物,在八国联军焚毁圆明园后移至未名湖畔。

乾隆在诗中阐述了两个道理,一是清明时节宜多种树。植树好处多多,除了可绿化家园,观赏美景之外,还能预防风灾,改善生态环境。二是以植树比喻做官。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,他解释说种柳树最容易成活,插枝即可,而且生长快,十年就可以成材,而种松树则不然,二三十年也很难长成参天大树,成林遮荫。做官和种树一样,不能立竿见影,马上见到成效,也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才能见到效果。所以当官不能一蹴而就,要有实干精神,心怀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,前人植树,后人乘凉。(摘自人民网)



人物名片

刘铁辉 70岁 从警40年

青春不再,却始终心系公安工作 容颜易老,不变的是忠诚为民的公安精神

刘铁辉：英雄梦成就交警梦 见证株洲交通发展

1949年,刘铁辉出生在清水塘附近的一户农家。家中兄妹众多,他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务农。刘铁辉从小就有英雄梦。如果玩角色扮演游戏,他一定是“维持世界和平”的那个人。从警40年,无论是路面执勤,还是参与株洲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,或是参与株洲交警队伍的建设,他一直奋斗在株洲交通事业最前线。



那个年代 “交通指挥全靠吹,信号控制全靠手”

1970年,全国大面积招工,20岁的刘铁辉来到株洲公安交警队(现株洲交警支队)如愿参警。

“记得穿戴的是上下全蓝的制服,第一次穿上警服觉得很神气。”刘铁辉回忆,殊不知,这一穿就是40年,虽然款式换了三四次。刘铁辉刚参加工作就被分配在栗树山学校路口处的岗位执勤。那时的道路狭窄,路面坑坑洼洼,灰尘满天。栗树山学校路段人流量集中,再加上以前这里是通往醴陵的必经之路,路段人车流量都很大,所以设立了执勤点。“除了这里,株洲当时还有文化宫的路口和贺家土的路口有岗位执勤。”刘铁辉回忆起曾经的交警生涯,津津乐道,“以前指挥交通,民警就站在路中央的“双层大蛋糕”上,连续不断地指挥交通,手势不停,嘴里的哨子也一直要吹,信号灯都是手动控制。”

那个年代 “通知交通事故靠吼,处理交通事故靠吼”

参加工作几个月后,刘铁辉开始到路面上处理交通事故。“因为车少,以前的交通违法也不多,私家车更少,最多的都是单位的车,所以很多驾驶员我们都认识,其中不少还能叫得出名字。”刘铁辉说。七十年代初期,整个株洲公安交警队不到40人。每名交警管一个区域,马路上发生交通事故,老百姓会奔走相告,也会有人直接给执勤岗亭打电话,告知事故具体地点。不过,当时路口没有监控和违法抓拍设备,如果肇事者跑了,只能凭交

警的火眼金睛和经验判断。直到90年代末,电子警察上岗,“通知事故靠吼,处理事故靠吼”的时代才算过去。“刚当交警那会儿,上街执勤主要靠走,后来条件好了就骑自行车,再后来队里分到了一辆边三轮摩托车,领导可把它当成了宝贝,别人都不让碰,每天来单位第一件事就是擦车,那亮得都可以反光了。”刘铁辉回忆,在那个年代,要是能配上一辆三轮摩托车,是非常拉风的事情,而如今交警也配备了警用摩托车,还有警用汽车。

那个年代 不止一家在做交通事故鉴定

“原来公安交警队、车辆鉴定所、农机部门都可以鉴定同一起交通事故。”刘铁辉说:“勘察现场标准不一,鉴定责任标准不一,非常混乱。”1986年,全国上下进行了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,让这种机构重叠,政出多门,互相扯皮,多头管理的交通管理体制一去不复返。刘铁辉有幸也参与了株洲市的道路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。因为改革需要大量数据支撑:株洲有多少机动车、型号是什么、一年发生多少交通事故、伤亡人数是多少、经济损失是多少……刘铁辉需要一一摸清。没有现代化的办公设备,当年,刘铁辉开着一辆破摩托车四处收集数据。手写的材料在刘铁辉的办公室里堆成山。一年下来,他用光了一箱墨水,十几支钢笔,“做事很较真的我甚至有点强迫症。所以容不半点差错,往往一句话没写对,一个数据有偏差,我都会仔细求证并重新写过。没有删除键的年代,只能换一张纸。”

参与株洲交通管理体制改革的,1990年,刘铁辉升任了郊区交警大队大队长,一干就是九年。刘铁辉回忆,当初到郊区交警大队时需要盖办公楼,而且领导要求这栋楼十年不能落伍。刘铁辉硬是兑现了承诺。这栋楼的屋顶是用晶莹剔透的琉璃瓦片覆盖而成,气势恢宏,屋内安装的全是进口空调。他说:“记得在改革开放十周年的一则国家级刊物上报道了这栋楼,将它评为红港路上的一个靓丽的景点。”

转眼,这栋楼快20年了,虽不是当年的郊区交警大队了,但在红港路上还是很打眼。2009年,刘铁辉退休。回望40年的风雨历程,作为一名交警,他感慨万千:“我见证了这么些年来株洲道路、交通管理的变化和发展,道路越来越宽,汽车越来越多,人们出行变得方便、快捷,株洲的明天也将会更好!”

(刘白 文/图)